

罗素访华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陈盼

新疆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830002；

摘要：由于中国思想界对罗素思想的推崇和对中国问题的关切，罗素在1920年受邀到中国讲学，随着对中国现状的深入了解以及察觉到中国新思想界的反应之后，他得出了中国适合走俄式社会主义道路这一论断。罗素思想在当时文人政客之间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场由罗素引起的争论给当时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中国也逐渐走上了与俄国相同的社会主义式道路。

关键词：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中西文化之争

DOI：10.69979/3029-2700.25.10.032

1 罗素访华缘由

1920年10月12日，受尚志学会、北京学会、新学会、中国公学四个团体的邀请，罗素携其女朋友勃拉克女士来华讲学，直至1921年7月从中国回到英国。将近一年的时间，做了大概二十多次演讲，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形成了“罗素热”，使中国思想界焕然一新。

1.1 中国思想界对罗素思想的推崇

罗素来华之际正值中国思想大变革时期，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军阀混战、奸佞横行、社会动乱不安、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先进知识青年奉西方文化为圭臬，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索救国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五四运动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第一次认识了马克思主义。

而在国内，在面临巨大的思想冲击后，中国文人政客也渴望从这位西方哲学大师身上找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中主席沈信卿致欢迎词写到“罗素先生为世界的哲学大家，其学说之价值，岂复待论，惟就鄙人个人观感所及。1.2 中国旧学说，常谓世界时时变迁，而有不变之理存乎其间，罗素先生之学说，有同于此种意义。（二）罗素先生主张改造社会与思想，而今日我国所亟需者，即在乎此，是所望于罗素先生在此一年之间，予我中国以种种指导。”可看出国人邀请罗素来华一是因为罗素先生在哲学方面突出的造诣，在西方早已声名大振；二是当时中国也急需寻找救国之路。

1.3 罗素对中国问题的关切

罗素来华的目的并不在于传播西学，而在于研究中国现状，他访华结束后所作《中国问题》便提到了他对中国现状问题的分析，他在书中旗帜鲜明的提出西方文化并不比东方文化优越，摒弃了西方文化中心论，从一个外部的视角分析了中国问题。

罗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与罗素的思想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了绝望。罗素在给奥托兰·莫雷尔的信里提到：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不是靠使人们成为无私的来保证的，而是通过使他们自己的生命攸关的动机与他人的动机相一致。这是可能的。我们现有的制度使得人们只有在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才能自我保存。这种制度有毛病；但是如果因为人们力求自我保存而厌恶他们，那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针对这种软弱性，我们必须有非常坚定的理想主义。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而转而投向东方的中国。西方的制度是在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资产阶级贵族的利益，在他看来这便是西方制度的“软弱性”。罗素访华并不是一次偶然的经历，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思想界对新知的渴望以及对救国道路的探索，另一方面是因为罗素先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和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更与当时新文化及五四运动的不断深入使得人们的政治热情与爱国热情被广泛激发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2 罗素关于中国改造的道路与方法

一个时代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固有的时代背景，五四前后中国境内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潮流，面对着宏大的思想体系，国人对它的认知也只是浅尝辄止，正是伴随着这种思潮，当时不少刊物杂志上都有关于社会主义的简要阐述。而罗素自称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的来华讲学，更加激发了中国人讨论社会主义的热情。

2.1 优先发展教育

罗素刚到中国，就应邀在上海进行讲演，1920年10月14日晚中国学者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了“上海七团体欢迎答辩”，就中国现状罗素先生认为“各种改造方法中，自以教育为第一义”。教育之效用，可分为三大好处，“（一）教人能做事，（二）叫人能做国民，（三）教人能做人。”而这种教育需是在国人自己的领导之下的，虽然很多西方国家在中国承担着教育工作，但是这种教育不能恰如其分的满足国人的需求，这也是罗素先生并不提倡国人全面学习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罗素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文化大加赞赏，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不愿移植此种不纯正之欧洲基本思想与中国，以蹈欧洲覆辙。”但是关于国人提出的对于中国现状问题的解决办法，罗素先生并没有给予直接建议。

2.2 渐进式改良道路

之后他在《社会改造原理》的讲演中提到“就欧美各国言之，实业发达，至于极点，此非幸福，中国实业，不要趋步欧美后尘。”在他看来，欧美社会制度压抑人的天性，使人处处受拘束，西方人沉迷于“工业技术”，并把工业技术当成社会进步的重要砝码，以此来掩盖他们费劲一切心机希望促成变化的欲望。他对西方制度失望至极，不愿中国与西方构建一模一样的文明。他主张中国实行渐进式改良道路，在讲演中提到了中国应该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免是中国未来发展产业上丧失了中国固有之审美上、精神上的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但这些都是罗素先生在不了解中国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建议，针对这种建议他也说了“能行于中国与否，亦不敢断定。”

2.3 中西结合

直到离华前，罗素在北京发表告别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经过自己数月对中国国情以及国际环境的考察和深入了解，他一改前期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评价，

在最后的演讲明确的提出“第一，在中国不应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不得不做出崭新的让步。”“走俄国人的路”，这是罗素先生在访华期间指给中国人的道路。罗素先生思想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前期对中国文化没有透彻的了解，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对中国现实的隔膜是可以完全理解的。

回国之后，罗素也并未放弃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于是《中国问题》一书顺势而出，他在书中系统论述中国问题的现状与解决方法，阐述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主张与看法。“中国人应该寻求独立，但是独立本身不是目标，而是实现西方技能与中国传统美德新融合的一种手段。”。他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的一大问题：缺乏科学，所以在他的讲演中号召国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中国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要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在当时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下的中国，罗素的来华无疑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活水。

3 罗素来华讲学引发的中西文化之争

20世纪初名哲来华讲学为国人了解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对于当时中国而言“名哲讲学不仅在其时中国的语境下传达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信息，而且也积极回应了充满新知渴望的中国思想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罗素来华讲学不仅使得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在当时文人政客之间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

3.1 新文化派对罗素思想的责难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誉，也就是因为他对中华传统文明的一些溢美之词，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深恶痛疾，导致了中国“保守派”与“新文化派”进行了一场争论。

中国的文明渊源流长，亘古不变：经过几代人之后，入侵者反变得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了……中国的文明远比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统的特性。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了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每个派别都希望通过罗素来加强其主张的说服力。风波的缘起是罗素的第一场演讲，1920年10月14日罗素在大东旅社发表讲话，在讲演中大加赞扬了中国文化。罗素此举引起了当时以新文化运动为阵地的思想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的警惕。

发难的第一声来自北京，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中刊登文章《罗素与国粹》，言“罗素来华了，他的第一场演说，是劝说中国人要保重国粹……但我却不能赞成。”在狠批一顿“国粹”后，又直言告诉罗素不明白中国国情，“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虽然事后罗素进行了澄清，但是这一事件也足以说明一位名哲观点对当时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此之后，罗素辗转去了杭州、南京、长沙，最后到达北京，而上海那次演讲似乎是一个转折点，责难、质疑之声慢慢增多。作为新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人陈独秀在听过罗素的几场关于社会主义演讲后终于忍不住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你主张中国应提倡实业与教育，不必提及‘社会主义’，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3.2 “东方文化派”对罗素思想的推崇

在当时新旧思潮争论高涨之际，邓中夏在《中国青年》首先提出“东方文化派”一词，即“一股新兴的反动派，主要以梁启超、章行严、梁漱溟为主。”“东方文化派”被新文化派贬为守旧反动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同时期新思想的主要旗帜，梁启超等人当时回归传统的思想言论不仅被激进派所排斥，更被视为五四新文化的对立面。罗素对西方文化的深恶痛疾与有“守旧复古”的梁启超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因而人们通常所说梁启超邀请罗素是为了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张目助威。”

“东方文化派”与罗素都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而西方文化有其不能忽视的弊端，所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应该保留自己优秀的本土文化。所以说

新文化派对梁启超等人的观点的批判只是停留在了表面，在当时西风强劲的时代背景下，思想进步、观念正确与否直接与西方文化是否由于东方文化直接挂钩，而“东方文化派”也无可避免的成为了批判对象。“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真正的反对派”，归根结底，不在于他们强调东方文化的固有价值，而在于他们‘以对东西文化以及一些西方哲学理论的研究为基础’，站立在了西方现代思潮变动中的一个新的思想支点——反省现代性上。”但是，不论是新文化派对西方文化的推崇还是“东方文化派”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辩证批判，都无疑给当时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罗素先生在逐渐了解中国文化现状以及察觉到中国新思想界的反应之后，就不再片面的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合理性，而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已不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做崭新的让步。”改造的重大责任，也理应由中国青年来承担。中国“新文化派”与“东方文化派”的争论也逐渐归于平静。

4 结语

中国政治风云变化之际，罗素作为一个眼光敏锐、豁达睿智、博学多才的形象来到中国，而他与中国思想界进行的东西方对话，是通过语言与文字的对译来实现的。他对中西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一是他肯定西方文化的弊端，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点，中国更不应该全盘西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要有选择性的去学习；二是西方文明具有最典型性的优点“科学”，这恰恰是中国文化所不具备的，而中国文明则具有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绵延千年而不断的最重要原因。但是对于如今的中国来讲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社会了，中国也必须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罗素来华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了解外国文化的最直接途径，由他而引发的争论也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水，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写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充满着悲情、困境、穷困与危机，但也充满着挑战与希望，罗素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也提到了中国未来的社会必将是由中国青年而引领的。罗素的中国之行已成历史，但他给当时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中国也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 年 10 月 16 日，第 3 版。
- [2] (英) 波特兰·罗素, 陈启伟译: 《罗素自传》，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 第 130 页。
- [3]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 年 10 月 16 日，第 3 版。
- [4] 袁刚: 《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演讲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5 页。
- [5]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 年 10 月 16 日，第 3 版。
- [6] 袁刚: 《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演讲集》，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14 页。
- [7] 《罗素, 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民国日报》，192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
- [8] (英) 波特兰·罗素, 田瑞雪译: 《中国问题》，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 年 286 页。
- [9] 郑师渠: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 年, 第 2 期。
- [10] 罗素, 秦悦译: 《中国问题》，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6 年 159 页。
- [11] 仲密: 《罗素与国粹》，《晨报》，1920 年 10 月 19 日，第 7 版。
- [12] 仲密: 《罗素与国粹》，《晨报》，1920 年 10 月 19 日，第 7 版。
- [13] 陈独秀: 《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1920 年 12 月 1 日，第 8 版。
- [14] 邓中夏: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1923 年 11 月。
- [15] 冯崇义: 《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919 页。
- [16] 郑师渠: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 年, 第 2 期。
- [17] 罗素: 《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民国日报》192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

作者简介: 陈盼 (1998.11), 女, 汉族, 籍贯: 河南省商丘市, 学历: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